

我生命中的淮海路

苏 秀

自从1952年，我从虹口的东长治路搬到长乐路三角花园附近，到1984年再搬到永嘉路译制厂新建的楼，直到2004年离开市中心，我在淮海路附近整整生活了52年。从青年到老年，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淮海路紧密相连。

首先是襄阳公园，离家又近，节假日是孩子们最好的去处。至今我还保留着我们夫妇和儿时的子女，在襄阳公园拍的照片。

住在淮海路附近的，还有我厂很多同事。例如我厂剪接组的蓝为洁，她的老公，就是著名导演汤晓丹。他们就住在襄阳公园对面的高塔公寓。她有时也会领着孩子到襄阳公园来玩。她的大儿子，那时好像还没上小学。他画一个孩子在放风筝，边上还有几个人在看，其中有老有少，而且表情各不相同。画得实在太生动了。我从没见过别的孩子画得那么好的。这个天才的小画家，就是后来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美术家汤沐黎。他的弟弟就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家汤沐海。他们父子被称为“一门三杰”。

那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影院礼拜天上午，都有学生专场，票价一律五分钱。我家出门没几步路，就是东湖电影院。顺着淮海路往东再走两条马路就是国泰。孩子们想看电影非常方便。

国泰电影院往东是一家很大的鞋店。这家店做的鞋，式样精致。以致2006年，《艺术人生》节目组请我们去北京做节目时，我想买双新鞋，还从老远的柳州路回到这里来买。再往东则是一家很大的绸缎店。这家店不光卖高档的绫罗绸缎，也卖手工织的蓝花土布。我非常喜欢用这种布做长袖衬衫。五六十年代做的一件穿坏了，就又做了一件。以致刘广宁惊叹道：“从我六零年进厂，就看见你穿这件衬衫，穿了20年还在穿。”这是后话。再往东就是我们上海市电影局的机关了。五六十年代常在电影局

的小礼堂，放电影、作报告。我记得的，就有夏衍关于“细节”的报告；还有电影局长于伶、剧作家瞿白音等人的报告。我还记得于伶有个特别好玩的习惯。他用两根手指夹着香烟，离头大约有半尺远。他要吸烟时，不是把手收回到嘴边，而是把头远远地伸到手边去。以致他报告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他的这个动作，我却仍然历历在目。

那时，所有刚拍好的影片，不论是上影自己拍的，还是北影，长影的，都会放给全局系统的创作干部看。有时，也会放国际上有影响的外国片。国庆十周年，上影拍了十部献礼片，头尾两部《聂耳》和《林则徐》，都是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被大家戏称为“红烧头尾”。《聂耳》在小礼堂放映时，剧中有人问聂耳“你多大？”赵丹回答“十九岁。”全场不禁哄堂大笑，因为自己人都知道赵丹那时已经四十出头了。

电影局斜对面有一家西餐馆，叫“宝大西菜社”。它的公司大菜每客一元钱，包括一盆汤，一道主菜，主菜每天是不一样的，有时是一块炸猪排，有时是一客罐焖鸡，有时是一客罐焖牛肉。还有一小块奶油，一小碟果酱。面包随便你吃多少。就相当于现在西菜社的套餐吧。那时我和张同凝的工资都是103元，李梓和赵慎之也有八九十元。花一元钱吃一次西餐，还不算太破费。所以每当电影局有活动时，我们就结伴去开一次洋荤，打一

次牙祭。

我老公，身高1米80。在学校读书时，就是篮球队的队员。上海解放时，他虽然已经30岁了，仍然是他们工业部第二设计院篮球代表队的成员。我则是我们电影局乒乓球队代表的成员。60年代前期，晚饭后，有时我们夫妻到淮海路上散步，往往顺便到陕西路体育馆看看，不管有什么比赛，篮球、排球还是乒乓球，我们都会花上五分、一毛买张票，看上一场。记得陕西路再往南，还有一座戏曲学校。学校的小礼堂，经常有演出。多半是学员的实习演出，所以票价也只有两三角钱。在李炳淑等人还是学员的时候，我就看过她和杨春霞、华文漪等四人演的《白蛇传》折子戏。有一次，居然还看到了俞振飞和言慧珠唱的昆曲《断桥》。他们二人可都是当时京昆界的大腕。可惜言慧珠这个一代名伶，竟在“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而自杀了。

我的三个孩子，都在淮海路或淮海路附近读书。我的长子牧心在淮海中学，就在淮海路襄阳路口。次子牧人，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师从盛建颐老师学钢琴，也在淮海路上，和淮海中学只隔一条汾阳路。我女儿牧遐在市二女中，离淮海路也不过一步之遥。我的几个孩子都在非常理想的学校读书。那时的我，是多么地意气风发啊。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特别

是68届的都要下去。我家牧遐、牧人恰巧都是68届。他们都去了吉林农村。

后来，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全国各设计院都要搬到山沟里去，于是我老公的第二设计院也搬到遵义去了。

牧心虽然根据政策留在上海，当了工人，但工厂在郊区，离家太远，也只能住到厂里去。因而上海家里，就只有我孤家寡人了。

1977年，恢复高考，牧心在结婚、生子后，考取上海师大中文系，再去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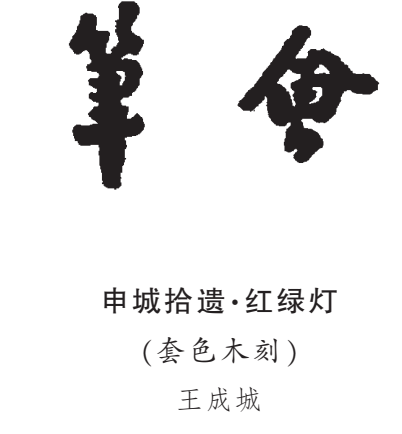
1978年，牧人凭借上音附小的童子功，考取了北京中央歌舞团歌队的钢琴伴奏。

1979年，我老公因年满六十，退休回到上海。

女儿牧遐也因为嫁到二院去，有幸随着二院迁回杭州。先是牧遐的女儿由于年满十六岁，可以回上海读书，户口报在我这里。2000年我老公因病去世。女儿、女婿退休后因为要照顾我的生活，也跟我住在一起。这样就显得永嘉路的房子过于狭小了。不得不像大多数老上海人一样，以地段换面积，把新居买在内外环当中的柳州路。

现在，偶尔因为朋友聚会等原因，回到淮海路时，我记忆中的淮海路已经了无踪影。当年与淮海路相关的喜怒哀乐，只有到梦中去追寻了。

2017年8月3日



2017年5月7日，著名数学家、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首届邵逸夫数学奖得主吴文俊先生在北京仙逝，享年99岁。他是1950年代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190位杰出科学家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38岁）。他又有松柏之寿，自然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笔者虽只在二十多年前在异乡见过吴先生一面，仍记得他的风采。

1919年5月12日，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朱家角镇。青浦位于上海西南角，系江浙沪三省市交汇处。青浦南与浙江嘉善接壤，吴先生的祖籍正是嘉兴，据说他的爷爷奶奶为躲避战乱迁来。朱家角镇地处偏僻，又是个小地方，因此很少有战事波及。也正因为如此，如今镇上古迹保留较多，属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吴文俊小时候，每年清明随家人回嘉兴祭祖。

吴文俊的爷爷是个秀才，却始终没做上官，后来主要靠教私塾养家糊口。到了他父亲的少年时代，家里经济情况更加糟糕。而他母亲的家族要殷实许多，主要从事手工业。按照中国民间传统，一个不甚富裕家庭有出息的男孩，常常会得到家族或乡绅的财力支持。正是在外祖父家族的资助下，他的父亲得以进入南洋公学，读完了预科，相当于高中毕业。

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前身，吴文俊的父亲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毕业后在上海的书局、报馆做翻译工作。其时肇始于上海的最有名的三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中前两家已经诞生，出版了大量好书，尤其是外国经典名著。出版人和报人家庭里通常有许多藏书，吴文俊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的藏书以及他们父子一起泡在书里的日子。

从吴文俊记事起，他家就住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里。画家徐悲鸿和蒋碧薇夫妇、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翻译家兼教育家严复，都在民厚里住过。那儿也是海派文人的聚集地。1922年，戏剧家田

吴文俊与上海

蔡天新

汉从日本返回上海，即寓居民厚北里，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施蛰存和戴望舒常来探望；民厚南里则住着创造社的社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吴文俊在家中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不幸弟弟夭折，因此他从小受到父母的特别关爱。四岁那年，吴文俊上了文蔚小学，就在家附近。笔者查阅过，文蔚一词出自《易经》，“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向小豹子一样慢慢地成长，长出好看的花纹，拥有高尚的品格。

可能是受父亲影响，吴文俊养成了阅读闲书的习惯，也爱看电影和话剧（最喜欢的演员是石挥）。他读的是大人的书，包括林纾翻译的小说，还有《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他一直记得梁启超说过的话，“英雄只在落后的国家才有”。吴文俊由此联想起“数学王子”高斯，高斯出道时，德国数学还比较落后，后来德国出了许多数学家，却再也没有出现高斯了。

初二寒假期间，日军对上海实行了大轰炸。因为担心宝贝儿子，吴家回到朱家角老家，躲了好几个月。可是学校并未停课，等到他们回到城里，文俊的功课被拉下一大截。语文还好说，数学根本听不懂了，他干脆不听，在下面看小说。结果呢，期末考试得了零分。这次考试对少年吴文俊是有警示意义的，从此以后，他不敢再怠慢数学课了。

高中时吴文俊的物理成绩相当不错，有一次考了满分。与此同时，物理老师却告诉校长，说文俊之所以物理好，是因为数学功底扎实。于是校长要求他报考交大数学系，答应考上

给一百大洋奖学金。那时交大学费需30大洋，吴文俊的父亲拿不出来，于是他只好听凭学校安排了。换句话说，当初念数学非他本意。

说到吴文俊的大学生活，笔者前不久刚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传记《孤独的精神》，从出生写到1921年为止，他在大学时念的也是数学。中文版有八百多页，但第二章《剑桥》一共才12页。巧合的是，《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邓若鸿、吴天驷访谈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有四百多页，第三章《大学》也只有12页。

吴文俊的学习方法是“读学懂”。所谓“读”是课本本身，“学”是指合上书自己能推导出课本里的定理，而“懂”是指所有概念和定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真正把他领入现代数学大门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副教授武崇林，毕业时他已经有了成为数学家的志向和自信了。武老师想帮他留校，可惜因为地位不高，又没留过洋，说话不管用。

吴文俊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用力学方法证明帕斯卡尔定理》，多年以后他写过一本名为《力学在几何中的一些应用》的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正是大学毕业论文的延展。华罗庚曾赞叹，“这本书比十篇论文都好。”2010年，此书与华罗庚等五位数学家的科普著作组成的“数学小丛书”一起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这一年的秋学期，已在上海的中学代课五年的吴文俊到杭州之江大学做了代课老师。这是吴文俊第一次在大学任教，他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如今的浙大之江校区度过了四个月的时间。虽说将来他报考交大数学系，答应考上

有从贵州迁回，但交大同学赵孟养通过亲戚把吴文俊的大学毕业论文呈现给几何学权威苏步青，想帮他在浙大找份工作。

赵孟养是吴文俊遇到的诸多贵人之一。1945年岁末，交大总体还留在重庆，但也已在上海复课。赵同学慷慨地把自己在母校取得的助教职位让给吴文俊。翌年春天，国民政府招考赴法留学生，也是赵同学第一时间把消息告知吴文俊。夏天，赵孟养还介绍他去见陈省身。其实，赵同学并不认识陈省身，而是凭着自己的交游才能和热情，委托他人引荐好友。

那时陈省身只有35岁，却已经出了大名了，他在美国数学圣地普林斯顿做出了不起的成就，使得“微分几何进入新时代”。抗战胜利后他回到祖国，奉命在上海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陈先生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条小弄堂，吴文俊见到他时只敢回答他的提问。可是不久，吴文俊便被招进数学所，地点在靠近枫林桥的岳阳路。从此他走上了数学研究的康庄大道，翌年又赴法留学。行前在上海，吴文俊得到第一篇数学论文，被陈省身推荐到《法国科学院周报》（Comptes Rendus）上发表了。

1951年，32岁的吴文俊从巴黎载誉归来。他在做了一年的北大教授后，调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那年春天，他回家乡出差，经亲戚介绍，认识了电信部门工作的姑娘陈丕和，她会英文和法文。两人一见钟情，几天后就“闪婚”了。年底陈女士调至北京，业余时间帮丈夫打印外语文文和专著。同时，接连生下四个儿女，并承担了全部家务。

从此以后，吴文俊过上舒坦安逸的生活，无疑也归功于上海女人的才德和修养。加上他本人的豁达和低调，即便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仍安然度过过漫长的生。198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作为理事长的吴文俊在上海复旦大学主持了纪念大会，他邀请巴黎时期的导师亨利·嘉当前来参加，也了却了作为学生的一桩心愿。

今年北京酷暑，天气闷热。暑假开始了，忙完几件必须忙完的事情，一口气看了四本关于登山的激动人心的书。有的书已高踞书架多年，书页上落上了一层细灰。读着这些关于高山的书，仿佛丝丝凉气拂面。

登山运动始终与危险相伴——风雪、滑坠、雪崩、雷电、饥渴、冰缝、落石、迷途、疲劳、疾病等等，遇到哪一个都可能是致命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深深地吸引着山友们，使他们不惧艰险，走进高山呢？作为一名山友，我很想知道著名的登山家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日本登山家植村直己在自传《远山在呼唤》中记述了一段对话：他背着脏兮兮的登山包出现在前往非洲的船上，一群人围上来。“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去非洲登山。”“什么山？”“乞力马扎罗山，肯尼亚山。”“没听说过这些山，你为什么登山？那里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喜欢。”“你为什么喜欢山？”植村大学时代开始登山时，他乡下的父母就问：“为什么要背着那么沉的东西去爬山？”

李致新上大学时申请加入学校登山队，负责的纪老师问：“为什么要登山？”回答：“第一，我喜欢登山……”为什么喜欢？这是他从没想过的问题。《梦上巅峰——中国登山家李致新、王勇峰攀登纪实》一书写道：“纪老师的问题他居然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越多，而他，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李致新说，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英国乔治·马洛里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登山家之一，1924年他第三次从西藏攀登珠峰，结果与年轻队友安德鲁·欧文一起消失在海拔8100米以上的皑皑白雪中。马洛里是在攀登的过程中遇难，还是登顶后在返回的路上遇难？这堪称是世界登山史上最大的谜团。1999年，一支由多国人员组成的马洛里及欧文搜寻探险队在北坡8230米处发现了马洛里的遗体，然而谜团依旧无解。在第二次从珠峰归来的1923年，马洛里回答一个问他为什么要回到珠峰的纽约记者：“因为他在那儿。”“因为山在那儿”听起来颇有机锋，后来成为了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珠峰幽魂——解开马洛里与欧文珠峰失踪之谜》的作者说：“这并不像出自马洛里之口，倒更像是那些活泼的纽约记者自嘲的话。马洛里太过浪漫也太过书生气，恐怕说不出这样简短、干脆的结论。”我倒觉得是可能的，明星式的马洛里可能超过一百次被问到这一问题，他不耐烦地应付了那么一句。随着马洛里成为一个神话式的人物，这句话才成为名言。

尽管登山家们说不清——或者不愿意说清自己的动机，然而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他们对高山的激情是不可解的。从登山者的时代和个人背景、言行等方面，还是可以理出一些线索来的。就说马洛里吧，除了“因为他在那儿”，一家报纸还刊登了他的一段更贴近内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攀登、或者是试图攀登世界最高峰到底有什么用，那我就一定得说“什么用都没有”。我们甚至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单单是为了享受成就的喜悦，还有那不可能抗拒的愿望，想要看到那些未知的世界。随着南、北两极被相继征服，宏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成了探险家们至高无上的乐园。

在19世纪末，南北两极相继踏上了人类的足迹，而这两大荣誉均与大不列颠无涉。西藏成为了地球上最重大的未知领域。《珠峰幽魂》这样说准备第三次攀登“地球第三极”马洛里：“他早已下定决心，以接近病态的狂热要征服这座山峰。为他的祖国，也为他自己。”登顶珠峰成了一场战争，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心事如山——恋山史》的作者罗伯特·麦克法伦说到1921年初次情定珠峰的马洛里：“当时三十五岁的马洛里，如果登顶珠峰并且成功地归来，他的成就带来的威望，无疑会让他在他有生之年衣食无忧。”这里解释了他攀登珠峰的功利的目的，然而仅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

功利动机是容易说清楚的，而“那不可能抗拒的愿望”，与危险相嬉戏的隐秘的激情，是难以言明的。而后者却是一个登山家之所以成为登山家的东西。植村直己自称：“我登山并非出于信仰，只是为心中的跃动而攀登。”他追求“独自攀登、独自享受”山峰的过程，所以总是喜欢一个人投入大山的怀抱。他在登山史上率先实现登顶五大洲最高峰的梦想后，最后的梦想为独自驾驶狗拉雪橇穿越南极大陆。他说：“我不是地理学家，也不是物理学家，没有进入南极进行科学调查的知识。但我希望能突破极限，发现自我。”

与《远山在呼唤》《梦上巅峰》《珠峰幽魂》这几本纪实文学作品不同，

为心中的跃动而攀登

黄 开 发

《心事如山》则是登山主题的学术小品集。麦克法伦是英国的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和作家，又是一个资深的山友。他把西方登山史、登山家传奇以及个人的登山经历穿插在一起，考察了人们对高山的观念的变革，深入地揭示了荒野高山是如何进入西方想象世界的。据他的考察，三个世纪前，高山是一种人们设法逃避的景观，冒险攀登会被视为精神错乱。然而，“十八世纪下半叶，人们第一次出于精神，而不是生活需要，开始向高山行进，与此同时，也开始发展出对高山景观的壮丽感受。”其中，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地质学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人们想象高山的方式，引导了人们对高山的认知，提供出一个去高山旅行的理由和借口——科学性的调查研究。十八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知识学说——“高尚说”，它颂扬混沌、强度、灾难、庞大和不规则，给对荒野景观的洞察力和当代对于恐惧的态度都带来了革命。

麦克法伦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学说变革的大背景下，解释了峰顶为何能强有力地吸引众多的向往。他指出：“探索空间——到更高的地方去——是人类思想中天生的冲动……有关高度的褒义词深深植入我们的语言，因而也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中。”他说：“近年来，高山顶点已经成为努力和回报的世俗象征。‘达到顶峰’就是到达努力的极限。站在‘世界最高点’感觉无与伦比。毫无疑问，从历史上来说，来自于到达山顶的成就感一直是对高度渴望的关键要素。这并不令人惊讶——有什么比攀登一座高山的成功更简单的寓言呢？峰顶提供了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山坡把挑战一路带领到顶点。”

当然不仅如此。现今人们对荒野高山的热爱源于都市化的生活和情感，都市人生从反向塑造了山友们的“山恋”。现代都市拥挤、嘈杂、空气污染严重，规则与潜规则森严，人与人关系复杂，日常生活琐碎、平庸。而高山则提供了一个与都市空间迥乎不同的场景。身处烟霞丘壑，可以疏远现实的羁绊，这是中国古人早已明白的道理。在那里，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新奇而又变幻多端的风景，丰富人生体验。麦克法伦说：“身处高山重新激起我们对有形世界的好奇”。攀登高山带几分冒险，然而冒险成为对日常生活平庸的抵御。装备的精良使得冒险越来越有惊无险，好比与危险的情人幽会，既能得偿所愿，又能全身而退——至少登山者相信是这样的。在挑战高山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我，肯定自我，超越自我。虽然不免自虐，却是自主、心甘情愿的选择，苦中有甜，甚至有一种自虐的快感。这表现出一一种浪漫主义式的个人情怀。登山成了追求自由的象征。

现代登山运动起源于阿尔卑斯山区。关于起源，有一个浪漫的传说：很久以来，阿尔卑斯山区流传着一种风俗。年轻男子向姑娘求爱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要历经艰险到达雪线附近，采摘一种被称为“高山玫瑰”的野花，献给自己的心上人。其实，所谓“高山玫瑰”只是一种灰白色的野花而已，在传说中它才变得美艳。显然，“高山玫瑰”是一种象征，人们把忍耐、坚持和美好的品质赋予了它。登山者对高山的热爱也是如此。山只是在那儿，其本身毫无情愫可言，然而在某种时代风尚的引导下，山友们把自身的情感和愿望投射在它身上。

2017年8月8日

